

梵本佛经进行了直接翻译的工程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“经典”翻译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。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,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“经典”从俄文版译成中文。苏联和俄文在当时起了中介的作用,与佛教东渐过程中的中亚国家及其俗语差不多。后来,才把起初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列“经典”著作直接从德文原文重新翻译成中文。

汉民族接触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,而逐渐认识基督教文化才几百年的时间。用历史的眼光看,中国人学习和模仿现代西方不过刚刚开始。如果看看佛教早期三、四百年在中国的混乱状态,或许更容易理解。为什么中国人直到今天对西方在许多方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,还存有各种各样的误会,概念上的混乱,学习上的盲目,甚至

是种族上的偏见。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:质量的精选和保证取决于数量的增长和积累。人们对西方的认识理解和学习也要经历了肯定——否定——否定之否定的过程,中西文化的融合永远不会终止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旅德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,旅德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1999年论文集[C].德国:1999.
- [2]鲁迅,鲁迅全集(第六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.118.
- [3]编委会,大唐西域记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4]编委会,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5]编委会,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.26.

院士专家纵论: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才是关键

甘子钊院士:建设世界一流大学,培养世界一流人才,这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大学应在国家的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贡献,一流大学的学生应为国家的复兴和崛起而奋斗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大学教育必然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,大众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社会急需人才。近几年,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逐步确定了“拓宽基础、淡化专业、因材施教、分流培养”的本科生教育理念,将由专业教育转向宽口径的基础教育,实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与高年级专业教育相结合,同时培养自主学习能力,减少课堂教学量。

丁伟岳院士:一流大学既要有好的老师,又要有好的学生。对于当前的大学来说,老师的素质需要提高,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,就不可能培育出高素质的学生。

现在中国的大学生课程都很重,没有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。要想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,需要宽松的学习环境,需要充裕的学习时间,更需要实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。

黎乐民院士:人才培养是和教育密切相关的,一方面要求学校有良好的师资力量,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一定的压力和竞争。一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一流大学只说明考试成绩优异,而真正的能力还体现在以后的科研和工作中。

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王晓秋:目前我国大学生比例并不高,有很多地区、很多岗位急需人才,而且特别缺乏蓝领和高级技师,但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,2003年大学生一次就业率仅为70%。这些问题暴露了我国教育体系、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还存在严重问题。为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教育改革势在必行。

(《科学时报》2004年3月31日)